

Cao Juren

Ersh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二十
世
纪
文
化
名
人
与
上
海

曹聚仁

微
生
有
笔
月
如
刀



丁言昭著
方全林
主編

上
海
社

Cao Juren

China's
First Emperor
in Hong Kong

曹聚仁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



三
十
年
代
文
學
人
物
上
卷

Ersb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文化名人与上海

C
A
O
J
U
R
E
N

微生有笔月如刀

曹聚仁

丁言昭著

方全林主編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曹聚仁：微生有笔月如刀

方全林 主编

丁言昭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75 插页 6 字数 101,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 本

ISBN 7-5320-6347-X/G · 6502 定价(软精):12.90 元

序

方全林

20 世纪这一百年,在中国,实际上都可看作是一种文化转型期。这是一个文化上承先启后的时代。新旧共存、争斗、交替,中西碰撞、排斥、融汇,使文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目。现在,20 世纪只剩下最后一年了。在 21 世纪的门槛前,回首一番 20 世纪的文化历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21 世纪的文化建设,无疑有必要从 20 世纪的文化历程中吸取经验,也吸取教训。而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在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有了上海这样一座城市,20 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变便有了不同。上海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而“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对于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应该是一种十分富有趣味的视角。

由于“江海通津”的地理位置，由于上海经济的繁荣和文化市场的发达，也由于旧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格局，使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人聚集之地。中国进步新文化的先驱和奠基者鲁迅、郭沫若、茅盾，中国革命音乐的开拓者聂耳、冼星海，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中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张元济，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邹韬奋，中国电影的最早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赵丹，中国现代京剧开宗立派的大师周信芳，中国现代美术巨匠刘海粟——都在上海留下了自己深深的文化足迹。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间，上海为各种文化人提供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生存条件，也为从事各种文化事业提供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环境。在 20 世纪前期的几个历史阶段，都出现过文化人从全国各地向上海汇集的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由此起步。这一运动初起时虽然以北京为中心，但由于北洋军阀的箝禁与镇压，再加上其他一些历史因素，不久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便开始向上海转移。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文化人也纷纷奔赴上海，把上海作为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1927 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的政治情势发生剧变，而上海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又成为各类文化人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最佳之地。从 1927 年到 1937 年的整整十年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那样活跃着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的各种文化工作者。数量众多的各种文化人常年集中在上海并积极开

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遂使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呈一时之盛。“卢沟桥事变”后,文化人汇聚上海又掀起一次高潮,那一时期,上海的抗战文化活动声势十分浩大。上海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爱国主义、不屈强暴的一种象征,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由于上海在这几个时期都成为各种文化人从事活动的舞台,就使得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与上海发生过深浅不一的关系。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留下辉煌业绩的文化名人,多数都在上海这个城市留下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脚印,多数都与上海有着或长或短的因缘。上海之所以能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几代全国最优秀的文化人士都曾经生活在上海,并在这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创造同时也相互制约的关系,上海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场所和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方式,而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又直接构成上海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在总体上营造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上海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双向同构、相辅相成的关系。以鲁迅为例,鲁迅是 20 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所作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而鲁迅从 1927 年定居上海到

1936年辞世，都一直生活、劳作和战斗在这座城市。鲁迅文化生涯中的一半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九年间，鲁迅不但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还办刊物、出丛书，介绍外国文学和美术。在这九年里，鲁迅与上海之间决不仅仅只有一种外在的关系。上海特定的社会政治格局和文化气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鲁迅文化活动的方向和方式。最后九年的鲁迅，关心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形成怎样的思想观念，等等，都与当时上海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鲁迅的存在，也对上海当时的文化气候和文学状况产生着明显的影响。由于有了鲁迅，在那九年间，上海文化界，尤其上海文学界，多了一点正气而少了一点邪气；多了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少了一些消极病态恶浊的东西。曾经有人指出，由于有了鲁迅的存在，当时上海的某些文人生活上都要检点些，惟恐丑行劣迹遭到鲁迅的嘲讽、斥责。于此也可见，鲁迅与上海文化之间，实在有着很内在的关系。

说到上海当年的文化地位，说到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上海当年所具有的那种文化精神，那种文化襟怀。文化上巨大的包容性，是这座城市能为中国现代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原因。数十年间，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文化潮流、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可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士，

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正因为上海具有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雅量,才使得怀有不同文化理想和艺术趣味的文化人士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精神。上海这块地域则是在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的。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与众多的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过影响,而上海的文化精神又反过来影响着在这里生活和创造的各种文化人——上海特有的文化精神不只是使得这些文化名人能够在这里生活和创造,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怎样在这里生活和创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是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丹纳在

这里说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精神气候对艺术创作的左右，这种看法也同样适合于总体的文化创造。上海这座城市曾经具有的精神气候，对栖身于此的文化名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无疑起着制约作用。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的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上海这座城市精神气候的制约，研究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也就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面目。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过程，而不断曲折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曾出现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出现过各种思潮，各种力量，最后历史选择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条道路。研究上海与文化名人的关系，有助于文化人、青年人进一步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由之路，对塑造新一代文化人的健全人格，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起着积极的影响，因为贯穿文化名人与上海关系中的主流因素，是知识分子与党与人民与祖国在一起，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品格。同时对于上海未来的文化建设也自能提供有益的启示，比如我们能从邹韬奋的新闻生涯中总结出进步新闻工作的规律；从张元济办出版社的过程中，抽象出出版如何保持高品位，保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从周信芳舞台活动中，领悟出民族文化的保存、发展的若干做法。回眸既往世纪的文化历程，正是着眼于未来世纪上海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可以少走弯路；同时，能激发上海市民、文化人对上海的自豪和热爱，激励和增强建设上

海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自信心,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跨世纪的历史使命。

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在每一个人那里,情形又都不尽相同。只有对每个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题性的微观研究,才能在总体上对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的关系有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把握。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决定组织力量,撰写出版一套“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

1998年12月

目 录

序	方全林
引 言	(1)
第 一 章 初闯上海	(3)
第 二 章 小试牛刀	(8)
第 三 章 三评吴稚晖	(16)
第 四 章 共同发起新南社	(23)
第 五 章 吃粉笔屑	(30)
第 六 章 教授的生活	(39)
第 七 章 初识鲁迅之后	(46)
第 八 章 掀起《涛声》	(54)
第 九 章 “我是罗亭”	(65)
第 十 章 家住花园坊	(73)
第十一章 为大众语运动推波助澜	(81)
第十二章 《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	(89)

第十三章	婚变·····	(98)
第十四章	戎马书生·····	(110)
第十五章	《中国抗战画史》隆重出版·····	(121)
第十六章	关于《蒋经国论》·····	(129)
第十七章	离沪赴港·····	(138)
第十八章	撩开神秘的面纱·····	(147)
第十九章	舐犊之情·····	(159)
第二十章	他与他的世界·····	(168)
后 记	·····	(172)

引 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文人,大多数都在上海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本书的传主——曹聚仁也是如此。

在传主生命的 72 个春秋中,最火红的年代是在上海,那是 1921 年秋到 1937 年 11 月。在这 16 年里,他得到了陈望道的信任、邵力子的提携、鲁迅的友谊、章太炎的赏识;他带着泥土的芳香踏上大学的讲坛,以青年人的敏感妙手著文章,用乌鸦为记掀起《涛声》,与朋友一起播下《芒种》,为“大众语”运动推波助澜,策划“南社”演变为“新南社”。就在这位热血青年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时,不幸陷入婚变的困境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致使他跳将出来,于是在激烈的淞沪战斗中,留下了他无数的战地通讯……

1945 年 8 月,曹聚仁回到上海,迎来了 1949 年 10 月的全国解放。

1950年夏，曹聚仁只身离沪赴港，1956年开始频频回内地观光，留给人们的是一个神秘的问号。当时间老人翻开90年代这一页时，披在曹聚仁身上的纱才被轻轻地掀去，原来他担负着神圣的使命，为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而努力着。

在一代作家、记者、教授离去二十多载的今天，让我们沿着传主在上海的足迹，领略一下他与他的世界吧！

第一章

初 闯 上 海

1921年的中秋是个阴雨天，月亮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孤寂地挂在天边。闪烁的群星躲在重重的黑幕后，冷眼旁观。

一艘从武汉开往上海的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船上的旅客，有的在吃月饼，有的在饮酒，有的在谈笑，有的在安睡，在底舱的一个角落里，有位青年正静静地看书，那是一本《桃花扇》，如果你留神看一下，会发现他正在吟诵书中的词句。棱角分明的嘴唇蠕动着，浓眉下的双眼噙满了泪水，挺拔的鼻子一翕一合，小伙子，怎么了？是被书中的柳敬亭感动了？还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沮丧？也许是兼而有之吧！

看到这儿，聪明的读者一定已经猜出，这个小伙子就是本书的传主——曹聚仁。

这位出生于1900年的浙江才子，从小被誉为神童，后又成为

浙江省第一师范的风云人物，谁知去投考南京东南高师和武昌高师却不就，可以想象，此刻他的心情有多糟糕。

呜——汽笛拉长了脖子有气无力地嘶叫着，意思是：我已到吴淞口，小船通通让开，我要靠码头了。

等船停稳，曹聚仁上得岸来，却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上海滩啊上海滩，热闹繁华有色彩，可我这穷学生，在此举目无亲，何处把身安？他望着前面的小道，忽然眼睛一亮，一个敦厚持重的形象跃出脑海，是谁？——陈望道。

难忘那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潮时，师生在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大较量中并肩战斗。当时，教育局要把一师校长经子渊调走，附带要解除陈望道、刘大白、夏丐尊、李次九4位教师之职。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曹聚仁领导同学们，抗议教育当局罢免经校长，从而发生了“留经运动”。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一个学校内部的事，其实是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大交手。

被称为“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望道，在风潮结束后，就回家乡义乌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底他到上海，和陈独秀一起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8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评论》，接着又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

此刻站在黄浦江边的曹聚仁，并不清楚陈望道老师在忙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一定会收留他，给他指点